

王锐
著

新旧之辨

章太炎学行论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王锐
著

新旧之辨

章太炎学行论

XINJIU ZHIBIAN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旧之辨：章太炎学行论 / 王锐著. —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7.11

ISBN 978-7-5598-0344-3

I. ①新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章太炎(1869-1936) — 学术思想—研究 IV. ①B259.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34903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：541004)
网址：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：张艺兵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衡阳顺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(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园艺村 9 号 邮政编码：421008)

开本：880 mm × 1 240 mm 1/32

印张：9 字数：176 千字

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：36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序

晚近以来，历史学领域里对所谓“重要人物”的研究，地位愈显尴尬。自从20世纪初期开始，一二有识之士鉴于过去的史书皆为“帝王将相之家谱”，遂倡导历史书写应以全体民众为对象，彰显每一位“国民”的价值，眼光从庙堂转向社会，用“民史”替代“君史”。随后，受到20世纪中后期的一系列社会运动与社会思潮之影响，史学研究更是提倡关注过去被“失声”与“边缘化”的群体，探讨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，如衣食住行、生老病死，其重要性被认为不亚于政治沿革、学术流变。即便是关于一个时代的思想与学术之研究，以往名盛一时的大人先生们渐渐开始被冷落，反倒是通俗读物、册子标语里面所体现的“思想”，成为书写思想史、学术史的重要资源。

然而，即便如此，历史上的“关键人物”，其重要性依然不容小觑，特别是在中国历史上。不必空谈抽象的道理，若要研究战国时期社会转型中的编户齐民，不可能不注意到孟荀墨韩诸家对于社会结构与人才流动的论述。宋代以降，文化日趋平民化，地方民间组织日益发达，但这其中能忽略朱陆理学家们的作用么？更无论所

谓魏晋风流，如果把王、谢诸人除去，那么一部《世说新语》又将从何谈起。研究近代社会的进化与竞争思潮，若不仔细绎读严复的著作，则虽下笔千言，鲜不成无源之水。笔者在这里不是重复所谓“英雄史观”，更绝非深闭固拒、顽固守旧，只是想说明在历史研究当中，对于被视为“重要人物”的关注，不能因学术风气之改变而有所忽略，但是研究方法与视角，却必须更为全面且细致。

本书通过几个具体案例，借梳理章太炎与同时代各类人物的交往与互动，呈现出章氏本人的思想与学术特色，同时勾勒出近代中国思想的些许面貌。章太炎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，早已毋庸多言。他深受清代朴学影响，青年时代师从俞樾、黄以周、孙诒让等清学史上的名家，治学强调实事求是、不发空论、语出心得，在小学与经学方面皆有极高的造诣，因而被人视为清代朴学之继承者。此外，他身处近代变局之中，思路与视野早已不局限于清人治学范围，而是“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”，亲历种种世变，遂对诸子之学多有精辟之论，不斤斤于锱铢考据；关于历史，他对西方近代的相关社会科学理论既能吸收，又能扬弃，加之对中国历代史籍之谙熟，所以其论史之作，特别是对中国历代典章制度与学术思想之流变，立论往往发前人所未发；在文学方面，他为文宗尚魏晋，青睐汪容甫，对传统文论中的许多问题进行探讨与反思，就定义何谓“文学”有着自己的独到之见，批判自《文选序》论阮元等人的文笔之辨，其文章与文论在近代文学史上足以占据一席之地。凡此种种，遂使得章太炎与当时学界有着非常紧密复杂且不容忽视的联系，若避而

不谈，数十载民国学术史，内容将减泰半，近乎断简残编。

民国初年，章太炎目睹袁世凯妄图帝制自为，不顾自身安危，面斥其非，遂被软禁于京，生死未卜。高一涵有感斯景，于是指出，章太炎“其最能辟脱吾国学者数千年之恒蹊者，则在离教而唱学”。质言之，过去中国学与教不分，导致“依教言学，终有所忌顾，不能验实学之真”，章太炎认识到了今世趋势乃教蜕而学唱，于是“会丁此运，其学遂创成两大特色：一则总观万法，示拘宗者排异之非；一则推阐真言，破泥教者依违之习。渊哉先生，用心玄远，此宗大昌，吾国学必结成一大异彩，别开生面于二十纪之东方也，可决然无疑已”。所以高一涵批评“今当道之钢先生，实则欲藉钢先生思想者，以一天下之心理”，这样做“其害至于率天下人各隐其真，相尚以伪。其神明，以多畏而不敢抒，其特操异秉亦以无所施用而浸废。一之之功未著而人心之腐于无形者固已多矣，和光同尘乃销磨特性之刃，同风一道固沈灭真理之媒”。因此，他声称“先生当世宿学，近代通儒，其存其亡，乃国华消长之问题，非其一身之祸福也”。^①力言章太炎对于中国学术界的重要性。进入20世纪20年代，出于各种原因，社会上研究国学之风日盛，不少学界名流与青年导师皆参与其中，而胡朴安则指出：“民国成立，《国粹学报》停刊，然而东南学者，皆受太炎之影响。《国粹》虽停，太炎之学说独盛。北京大学者，学术荟萃之区也，为姚永概、马通伯、林琴南所占据，

① 高一涵：《章太炎自性及与学术人心之关系》，载《甲寅》，第1卷第5号。

不学无术，奄奄一息焉。自刘申叔、黄季刚、田北湖、黄晦闻，应大学之聘，据皋比而讲太炎之学，流风所播，感应斯宏。自申叔贬节，媚于袁氏，而有《中国学报》之刊，国师之讥，学术大受打击。所幸太炎受袁氏拘禁，始终不屈，而士子信仰其学者，至今不绝。《国故》与《华国》及东南大学之《国学丛刊》，皆《国粹学报》之一脉，而为太炎学说所左右者也。”^①胡适在1922年的日记中品评当时的一些老辈学人：“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。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、罗振玉、叶德辉、章炳麟四人；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，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。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，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，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。”^②不过即便如此，据蓝文徵回忆，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初创之时，校长曹云祥问及胡适对于研究院导师的意见，胡适答曰应该聘请梁启超、王国维、章太炎来掌教习，同时陈寅恪也有相类似的主张。^③钱穆甚至认为，胡适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（卷上）一书，“称述先秦诸子，大体因承章氏《国故论衡》之意，惟文言、白话有所不同而已”^④。其中的显隐因缘，远非“新”或“旧”这样的观念可以概括。

近代中国，遭逢世所罕见之变局，身处其中者，感觉到周围耳

① 胡朴安：《民国十二年国学之趋势》，载《国学汇编》第1集。

② 曹伯言整理：《胡适日记全编》（第3册），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1年，第775页。

③ 蓝文徵：《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》，马强才选编：《蓝文徵文存》，南京：江苏人民出版社，2012年，第267~268页。

④ 钱穆：《谈当前学风之弊》，载《学龢》，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207页。

闻目睹之景，与前史所载大不相同。章太炎在 1922 年感慨道：“自有书契以讫于兹，其为五十年者，不知其几也。其变之亟，略无有过于今者。以今之五十年中解之，后之变者又转亟于前，持论之士无虑数十人，非徒随之，且有造之者矣。当其造也，不知其奚以造也。变既成矣，已处于变之中，而又恒然不知所如往。坐而议之，若执符契，然少选必有齟焉不自得者，此其何故也？以其变不胜推也。”^①后来周佛海也同样有此感观：“我年龄不过四十余岁，参加政治生活，也不过十六七年，所亲自经历的事情，较之几朝遗老，革命先辈，当然要少得多，配不上说阅尽兴亡，历尽盛衰。不过自从中华民国成立，至今三十一年，在这个短短的时期之中所发生的盛衰升沈的事实，实在比升平时代一百年中所发生的要多得多！所以浮沈于这个三十一年中的人们，其所遭遇的变化，其所感觉的沧桑，一定比升平时代的三十一年，要丰富而深刻得多。”^②在这样的时代里，道术将为天下裂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学界也和朝堂一样，不出十数年，便是“王侯宅邸皆新主，文武衣冠异昔时”。

20 世纪 30 年代，有人曾说：“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学风，如果把一部学术思想史分起段来，便是很显然的，学风是时代的风尚，自然而然的有人在那儿倡导，也自然的有人跟从，渐渐成为一般学者的规范，一个时代的转机，都是以这种风尚为原动力，而这种风

① 章太炎：《最近五十年序》，载《章太炎全集》（第 5 册）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4 年，第 140~141 页。

② 周佛海：《盛衰阅尽话沧桑》，载《古今半月刊》，第 13 期。

尚的转移，都是由于习惯和态度的转变，都是有时代的关系存在着。”^①新文化运动以来，新思潮传播越发广泛而激烈，一批倡导斯事者也借着这股风气成为新的学界领袖。胡适说：“人家骂我们是学阀，其实‘学阀’有何妨……我们应该努力做学阀！”^②既然有此宏愿，那么如何对待在学界“威望犹存”的章太炎，也就成为胡适必须面对之事。据王奇生先生的研究，白话文的提倡，为当时新文化运动诸多项目中最受人们关注者。^③正所谓不破不立，白话文提倡的同时，乃是伴随着对先前诸家文论与文章的批评，如此方能体现白话文的价值与意义。在胡适看来，章太炎“古文学功夫很深，他又是很富于思想与组织力的，故他的著作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都能‘成一家言’”。但是，由于章氏奉魏晋文章为论文圭臬，因此，“他究竟是一个复古的文家，他的复古主义虽能‘言之成理’，究竟是一种反背时势的运动”。总之，“章炳麟在文学上的成绩与失败，都给我们一个教训。他的成绩使我们知道古文学须有学问与论理做底子，他的失败使我们知道中国文学的改革须向前进，不可回头去；他的失败使我们知道文学‘数极而迁，虽才士弗能以为美’使我们知道那‘取千年朽蠹之余，反之正则’的盛业是永不可能的

① 倪渭卿：《时代与学风》，载《新声月刊》，第2卷第1期。

② 曹伯言整理：《胡适日记全编》（第3册），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1年，第496页。

③ 王奇生：《新文化是如何“运动”起来的》，载《革命与反革命：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》，北京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10年，第34~37页。

了！”^①其实章太炎又何尝未曾考虑过胡适所引以为功的白话文，只是他强调“文字训故，必当普教国人。九服异言，咸宜撝其本始，乃至出辞之法，正名之方，各得准绳，悉能解喻”。在这之后，方能再言其他，否则“行之不得其道，徒令文学日窳”，最终“文语交困，未见其益”。^②此外胡适又言，章太炎与严复、章士钊等人最大的局限性，就在于彼等的文章从来没有“最大多数人”的观念，难以让普通民众读得懂，故而未尽“达意”之责。^③这一观点，未免以今视古，苛责前人。章太炎在清季借文字鼓吹革命，然其所影响者，实在彼不在此。冯友兰说：“辛亥革命的一部分动力，是绅权打倒官权，就是地主阶级的不当权派打倒地主阶级的当权派。”^④姑且忽略所含的意识形态话语，其看法不为未见，士绅阶层之向背，实为清廷存亡与革命成败的关键。章太炎以古学名家而投身革命，著书立说，这一行为本身，便足以在士人群体里激起极大影响。所以与章氏熟识的孙宝瑄在当时便说道：“荀汉所著书出。颇鼓动一世，造孽无穷。”^⑤这些史事，岂能简单地用文言白话之高下来诠释。

钱基博云：“古训是式，洞见本原，以六书小学为门户；以《官》

① 胡适：《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》，欧阳哲生编：《胡适文集》（第3册）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228~234页。

② 章太炎：《国故论衡·正言论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44页。

③ 胡适：《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》，欧阳哲生编：《胡适文集》（第3册）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110页。

④ 冯友兰：《三松堂自序》，南京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34页。

⑤ 孙宝瑄：《忘山庐日记》（上册）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年，第470页。

《礼》《左氏春秋》、周秦诸子为崖郭；而旁参释乘以究悟慈氏世亲书为精神命脉；庶几乎所谓‘诵数以贯，思索以通’；厥见乃与汉唐诸儒笈疏琐碎殊者，有人矣，余杭章炳麟也。”^①在其他地方他又言：“现在一般治国学者，讲到做客观的外证工夫，最有成绩，要算章太炎先生治《说文》和诸子，他不但能‘多学而识之’，也很能‘一以贯之’！这是人人知道的。”^②钱基博与唐文治等人关系紧密，虽然他也曾景从风气，试图用远西分类标准重构中国传统学术，但后来对新文化运动以降的新式学风颇多批评。其所著《现代中国文学史》一书，只留给席卷一世的白话文为数不多的篇幅，并且语多讥刺，这在新学后生看来，实乃极端反动，懵于时代趋势。而他发此议论，可见并不视章太炎为异路。但是杨树达在 20 世纪 30 年代自记：“检斋（吴承仕）近日颇泛览译本‘社会经济学’书，闻者群以为怪，交口訾之。一日，一友为余言之。余云：‘君与余看新书，人以为怪，犹可说也；若检斋乃太炎弟子，太炎本以参合新旧起家，检斋所为，正传衣钵，何足怪也？’”^③正所谓“参合新旧”，在当时其他笃守故常者的眼中，太炎学说，绝不可率尔视作同道。

柳诒徵在 20 世纪 20 年代批评其时的子学研究，认为许多离奇

① 钱基博：《〈茹经堂外集〉叙》，载《钱基博集·国学文选类纂》，武汉：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3 年，第 68 页。

② 钱基博：《国学之意义及治国学方法之评判》，载《钱基博集·国学文选类纂》，武汉：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3 年，第 57 页。

③ 杨树达：《积微翁回忆录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7 年，第 55-56 页。

之说的始作俑者之一便是章太炎。他指出：“章氏之论孔、老，则似近世武人政党争权暗杀之风。”然后反驳道：“不知‘乌鹊孺，鱼傅沫’等语，何以即有夺老子之名，且含逢蒙杀羿之事之意。庄以名其任化，章乃目为背师。是直不知老、孔为何等人物，故以无稽之谈诬之也。”^①对此，章太炎曾专门致信解释，强调自己当年此论，主要是借“订孔”以“订康”。^②但是柳氏后来在其《中国文化史》中，又指出章太炎《检论》里对于孔子“忠恕”思想的解释之非，认为：“章氏偏重知识，匪惟误解《论语》，抑亦误解《戴记》，断章取义，贻误后人，匪浅鲜也。”^③与之相似，陈柱批评章太炎“讥孔子为国愿”“高谈诸子而刍狗六经”，乃是“数典无祖”“哗世取宠”，视之为近世学术界的洪水猛兽之一。^④张尔田于民初孔教存废的论争中，坚持建立孔教的必要性，对于反对以宗教视儒学的章太炎，他强调：“太炎文臬，陈谊高简，浑浑噩噩矣。虽然，真理之在天壤，如水银泻地，未必太炎为是，而沟犹瞽儒为非。”^⑤及至晚年，张尔田仍然指出：“自有一般学者，不承认孔子为教祖，欲夷孔子与诸子为伍。其讲孔子，则杂之于道、法、名、墨之中，

① 柳诒徵：《论近人讲诸子学之失》，柳曾符、柳定生选编：《柳诒徵史学论文续集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1年，第515页。

② 朱维铮：《求索真文明——晚清学术史论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273页。

③ 柳诒徵：《中国文化史》（上册）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年，第273页。

④ 陈柱：《六艺后论序》，载《待焚文稿一》，台中：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，2008年，第426页。

⑤ 张尔田：《孔教》，载《甲寅》，1914年第1卷第3号。

而于是中国文化之来源，永无明了之一日。”^①将章太炎之反对孔教，上升到致使中国文化来源不明的“高度”。虽然章太炎在民国以后被一些趋新之士视为“保守落后”，但是在一些同样是被视为“保守落后”的人眼中，章太炎由于有过“批孔前科”，因而并不被后者视若同志，反而是对之颇有微词。章太炎思想本身所蕴含的复杂性，以及他与民国学界之间纷繁错综的关系，于此可窥一二。

总之，章太炎与近代学界（包括政界）因缘颇多，关系复杂，不同立场的学人或群体，在不同时段对章氏的态度各有差异，而章太炎本人也与彼等有着并非泾渭分明的联系与互动，其中许多史事，颇为隐晦，微妙曲折之处所在多有，这些都十分值得研究。梁启超曾说：“我的理想专传，是以一个伟大人物对于时代有特殊关系者为中心，将周围关系事实归纳其中，横的竖的，网罗无遗。”^②所谓“网罗无遗”，笔者樗材浅识，难企斯境，但是尽可能地以章太炎为中心，梳理、叙述他与同时代诸人一些尚值得探讨之处，从史事中呈现其思想内涵，以此丰富对中国近代思想史、学术史的认识，展现当时丰富的历史图景，使今人对前人走过的路能够心生敬意，不妄加非议，同时明其得失，吸取教训，以图将来。述往事，思来者，区区初衷，尽于是也。

① 张尔田：《论中国文化及其宗教道德》，载《汉学》，第1辑。

② 梁启超：《中国历史研究法（补编）》，载《饮冰室合集·专集之九十九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9年，第38页。

目 录

1	章太炎、钱玄同对颜元学说的阐释与讨论
36	钱玄同对章太炎学术思想之取舍
98	章太炎与近代四川学界
161	章太炎与梁启超
192	1926 年南京制礼事件述论 ——兼论身处其中的章太炎
223	附录： 世变与学变下的传统思想 ——近代学者对“道家出于史官说”之阐释
259	参考文献
272	后记

章太炎、钱玄同对颜元学说的 阐释与讨论

昔日梁启超论清末以来思想与学术之流变，认为：“凡大思想家所留下的话，虽或在当时不发生效力，然而那话灌输到国民的‘下意识’里头，碰着机缘，便会复活，而且其力极猛。”因此，“总而言之，最近三十年思想界之变迁，虽波澜一日比一日壮阔，内容一日比一日复杂，而最初的原动力，我敢用一句话来包举他，是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”。^①在这股时代思潮当中，黄宗羲的《明夷待访录》在时人看来与近代西洋民主政治理论若合符契，许多忧国之士遂对之极力表彰；王夫之的强烈的夷夏之辨，使得立志于排满革命之士对其倍加推崇；顾炎武由于被视为清代朴学开山者之一，加之《日知录》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等著作中显现的经世主张，更是广受思想学术立场互异的各派士人之关注。更有甚者，随着清廷统治危机的加剧，不少朝廷大吏纷纷上疏，建议将这三位晚明大儒入孔庙从祀，这也反映出当时不同政治集团为了各自

① 梁启超：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，朱维铮校注：《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》，上海：复旦大学出版社，1985年，第123页。

目的，互相争夺文化资源，具体而微地呈现了晚清思想界之异动。^①

较之顾、黄、王，颜元的思想主张虽然独树一帜，但三人在当时与后世的影响力却是颜元难以企及的。习斋力辟宋明儒空谈性理、静坐读书之风，一反历代儒者文弱形象；强调实践之学，希图恢复古之“六艺”，并希望能身体力行；同时关注经世之学，倡均田、严选举、主练兵，以待一旦天下有变而能有所为。^②其学说在当时，仅流传于北方一隅，^③弟子李塨、王源等，虽极力表彰宣传师说，但由于习斋不热衷著书立说，且思想主张、理想过高，因此除非志存高远者，否则难以真正服膺效仿。而李、王等人，为了与学界互动，不得不迎合主流学术思潮，这样自己在思想上反而受其影响，渐渐与乃师立场颇有背离，终究沦于书生纸墨一路。^④后来胡适出于表彰之意，勾勒出一条以程廷祚为中介，习斋之学如何影响到戴震思想形成的线索。^⑤但正如论者所言，因为反

① 户华为：《晚清社会思想变迁与圣庠的最后演出——顾、黄、王三大儒从祀风波探析》，载《社会科学研究》，2005年第2期，第134~139页。

② 关于颜元学说较为全面系统且要言不烦的介绍，依笔者愚见，当推陈登原的《颜习斋哲学思想述》（上海：东方出版中心，1996年）一书。

③ 刘师培：《幽蓟颜门学案序》《井青雍豫颜门学案序》，章太炎、刘师培等撰，徐亮工编校：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231~234页。

④ 钱穆：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（上册），台北：台湾商务印书馆，2009年，第241~242页。

⑤ 胡适：《颜李学派的程廷祚》，欧阳哲生编：《胡适文集》（第10卷）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378~413页。

宋儒便将诸人凑入一个系谱之中，有推论过当之弊。^①总之，颜元学说，在清末以前影响力着实有限。

及至近代，随着剧烈的世变与学变，颜元学说重新受到重视，他的思想被从许多不同的面向予以挖掘。如初出茅庐的毛泽东投稿《新青年》论述体育强国之时，就征引颜李生平以为佐证：“清初之世，颜习斋、李刚主文而兼武。习斋远跋千里之外，学击剑之术于塞北，与勇士决而胜焉。”^②显示出颜李思想在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中间的传播之广。在近代习斋学兴起的脉络里，章太炎无疑是要角之一，他在《馥书》的重订本中声称颜元堪称继荀子以后的又一“大儒”^③。如果联想到章太炎对荀子的异常推崇，那么对颜元的这一评价，可以视作极高的表彰。而章太炎的诸弟子当中，钱玄同同样非常欣赏颜元之学。新文化运动以来，钱玄同高唱反传统论调，对中国传统思想极力抨击，然即便此刻，他依然在日记中自言：“我最佩服颜习斋，我也佩服王阳明。我遇到精神烦闷之时，惟颜、王的议论可以作吗啡针用，昔年如此，至今犹然。”^④

① 王汎森：《程廷祚与程云庄——清代中期思想史的一个研究》，载《权利的毛细管作用：清代的思想、学术与心态》，台北：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，2013年，第535页。

② 毛泽东：《体育之研究》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、中共湖南省委《毛泽东早期文稿》编辑组编：《毛泽东早期文稿》，长沙：湖南人民出版社，2008年，第58页。

③ 章太炎：《馥书（重订本）·颜学》，载《章太炎全集》（第3册）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4年，第151页。

④ 杨天石整理：《钱玄同日记（整理本）》（中册）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4年，第498页。